

朱舜水與德川水戶藩的禮制實踐*

徐興慶**

摘要

朱舜水（1600-1682）與日本德川前期的朱子學者、陽明學者乃至古文學派學者，直接或間接有所往來，和當時日本儒教的發展有著深遠的關係。綜觀朱舜水的文章、書簡、筆語以及其諸多門生的相關文獻，可以窺見舜水常與日本的官、學界人士闡論其學問主張。在朱舜水居留過的長崎、江戶、水戶，乃至不曾前往的九州鹿島藩（今佐賀縣）、柳川藩（今福岡縣）以及遠在日本海的加賀藩（今石川縣）等，都有其推展儒家思想的事跡。

本文從（1）德川前期儒教發展的「雜學性」；（2）朱舜水與水戶藩儒教發展的兩個角度切入，以「興教育、行禮制」、「養君德、親賢士」等儒家基本德目「禮」的思想為探討主軸，檢視朱舜水與德川光圀（1628-1700）的關係及其對水戶藩的禮教主張與實踐情形。

關鍵詞：朱舜水 禮制實踐 德川光圀 興教育、行禮制 養君德、親賢士

100.3.3 收稿，100.6.22 通過刊登。

* 本文為執行 98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從空間、境界、遷移檢視朱舜水思想體系與日本德川儒學發展的關連性（Ⅲ）」（NSC98-2410-H-002-177）之部分研究成果。承蒙二位審稿人惠賜修改意見，謹此致謝。

** 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國人研究員

一、前言

朱舜水（1600-1682）旅居日本長達二十二年，與德川前期的朱子學者、陽明學者乃至古文學派學者，都直接或間接有所往來，和當時日本儒教的發展有著深遠的關係。綜觀朱舜水的文章、書簡、筆語以及其諸多門生的相關文獻，可以窺見舜水常與日本的官、學界人士闡論其學問主張。據《水府系纂》記載，在接受水戶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0）招聘之前，舜水曾經和往赴長崎的水戶藩儒小宅生順（1637-1674）筆談，留下相當珍貴的文獻《西游手錄》（抄本現存於東京水府明德會）。朱舜水文集中同時也收錄了「與小宅生順書三十六首」、「答小宅生順書十九首」等信函，內容反映舜水對振興水戶藩儒教的諸多構想。對於小宅生順出示〈擬興國學書〉說明德川光圀有意普及教育並表達招聘意願時，舜水表示「興國學事是國家大典」，必須以聖學為依歸。獲知光圀「讀書好禮，雅意欲興聖人之學」，這成為促使舜水應聘的關鍵因素。¹其後，從〈答小宅生順、野傳論建聖廟書〉一文中論及廟址距離國都遠近問題、力主「聖廟與學校不宜相去」之內容，²亦可明瞭舜水實際參與聖廟興建事宜，推展以孔子儒教為主之聖學，期以倡導道德禮教，對教化德川社會作出貢獻。朱舜水深厚的學養及其坎坷的人生經歷，在居留過的長崎、江戶、水戶，乃至不曾前往的九州鹿島藩（今佐賀縣）、柳川藩（今福岡縣）以及遠在日本海的加賀藩（今石川縣）等，都有其推展儒家思想的事跡，其內容為何？值得深入探究。

筆者近幾年來，主要以「朱舜水思想體系與日本德川儒學發展的關連性」作為研究對象，將焦點置於朱舜水如何在德川社會展現其思想面貌，從人物交流探討這個時代的思想群體之關連性。³本文的問題意識亦在這個前提之下展

1 朱舜水，〈答小宅生順問六十一條〉，朱謙之編，《朱舜水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411。

2 朱舜水，〈答小宅生順、野傳論建聖廟書〉，《朱舜水集》，頁321。

3 例如：拙稿，〈異域知識人の出会い：朱舜水と安東省菴の思想異同試論〉，《日本漢文學研究》第4號（東京：二松學舍大學 COE 卓越研究計畫，2009），頁218-256。同〈日本的朱舜水研究史〉，《杭州師範大學學報》（中國大陸中文核心期刊），2009年第31卷第4期（總第180期），頁1-7、29。同〈加賀藩における朱舜水の思想の普及〉，《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文化情報の発信と受容》（東京：雄松堂，2010），頁439-457。同〈近世における日中の経世致用観：朱舜水と貝原益軒を比較して〉，《経書解釈の思想史：共有と多様の東アジア》（東京：ペリカン社，2010），頁59-96。

開，從文獻解析的角度切入，嘗試從思想史、儒教普及的視域出發，盡可能對朱舜水在水戶藩推行禮制的過程及其影響作深入的剖析，目的在檢視朱舜水接受水戶藩召聘時所提「不論祿，而論禮」⁴的準則，如何落實在水戶藩的禮制實踐上。

二、德川前期儒教發展的「雜學性」

德川前期，亦即自德川家康（1542-1616）一統日本至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1641-1680）治世結束的1680年止。這個時期日本的佛教或儒教皆與政治有從屬關係。朱舜水寓日之際，德川幕府政權穩定，逐漸朝著文治社會的方向發展。學問方面，重視宋、明儒學，尤以程朱學為主流。德川家康雖然重用林羅山（1583-1657），但是當時僅明文禁止西洋教，其他各種學派多能有自由發展空間，而佛教尤其盛行。其中，儒教與神道的關係，基本上是接受「神儒一致」的「習合」（教義折衷）現象，當時主張儒教與神道本質相同者，實不在少數。

依照井上哲次郎的說法，德川前期日本儒教的特色具有多元的「雜學性」。導入宋學的是藤原惺窩（1561-1619），其門生林羅山、山崎闇齋（1618-1682）等都是「去佛就儒」者，他們並無強烈的闢佛態度。惺窩在某種程度上是得儒佛二教之道，對程、朱、陸、王的思想都產生共鳴，甚至對莊子思想亦涉獵頗深，在儒學發展過渡期中，惺窩的「雜學性」最為顯著。⁵林羅山則對發展朱子學不遺餘力，但因生於神道之家，原本即存有「神儒調和」的思想，⁶又精通王學、老莊思想，多少也受到一些影響。闇齋曾經研究神道，同時以禪僧身分先修朱子學後還俗，其後提倡「神儒一致說」，成為垂加神道之祖。黑住真也論及惺窩的弟子松永尺五（1592-1657）在《彝倫抄》（1640跋）宣傳儒教時也導入了佛教的概念。⁷山鹿素行（1622-1685）雖依堯、舜、孔子之道，確立「聖學」，但年輕時接納兵學、神道的傳授，並兼修歌學、物語等和學（日本學）。

同〈東アジアの視野から朱舜水の思想と宗教観を考える〉，《東アジアの宗教と思想》（大阪：關西大學文學部，2010），頁141-161。

4 朱舜水，〈答小宅生順問六十一條〉，朱謙之編，《朱舜水集》，頁411。

5 井上哲次郎，《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東京：富山房，1945年版），頁29-30。

6 西晉一郎指出，林羅山著有《本朝神社考》、《神道傳授抄》、《神道秘訣》等書。見西晉一郎講述、野口恒樹・野木村規矩雄筆記、木南卓一校補，《日本儒教の精神：朱子学・仁齋学・徂徠学》（大阪：溪水社，1999），頁39-40。

7 黑住真，《近世日本社会と儒教》（東京：ペリカン社，2003），頁20-21。

陽明學派的中江藤樹（1608-1648）在其《鑑草》（1645）中，也表明「明德佛性」的立場。⁸顯見德川前期的代表性儒者，兼有神、佛色彩者居多，存在著武道、藝道等多重學藝。此外，當時日本儒者們都有併用漢文、訓點漢文、漢文及假名混合體等情形，其語言體系如何定位，亦是另一個複雜的問題。⁹綜觀上述現象，不難窺知德川前期儒教的發展，確實存在著多重的複雜性格。

1665年7月朱舜水抵達江戶時，日本的儒教已呈現多元發展，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1604-1651）之弟保科正之（1611-1673）熱衷朱子學，目的在確立身分制度，以落實幕藩體制的運作，不過他同時也受到闇齋的影響，提倡神儒一致的學說。其他，如岡山藩主池田光政（1609-1682）招聘陽明學者熊澤番山（1619-1691），協助教化該藩的武士階層；加賀藩主前田綱紀（1643-1724）積極普及儒教，除朱子學相關典籍外，廣蒐各家文獻史料、大力從事編纂事業；寬文年間（1661～1671），加賀藩的漢籍收藏達到高峰，奠定了「尊經閣文庫」的基礎，當時主要獻策者就是與舜水有深交的朱子學者木下順庵（1621-1698）。另有獨創武士道論的山鹿素行，雖因排斥朱子學而深居赤穗藩（今兵庫縣），後來著作《聖教要錄》尋求回歸古代聖賢之道而能獨樹一幟。因此，程朱學只能視為德川前期儒教發展的一部分，並非一開始就被幕府立為「官學（正學）」，或者排擠其他學派的發展。不過根據統計，截至十八世紀末期「寬政異學之禁」（1790），在日本各地藩校推展教育者共1,912人，其中朱子學者即多達1,388人，而出自林家或昌平坂學問所者計541人。換言之，朱子學者占總數之七成以上，成為近世日本最大的學派。¹⁰

1665至1682年間朱舜水於江戶、水戶講學，在當時這種「雜學性」顯著、百家爭鳴的時代背景下，一方面以開物成務、經邦弘化為學，強調聖賢之道，同時對程朱理學又主張「取其精意」。¹¹當近江水口（今滋賀縣甲賀市）藩主加藤明友（1621-1684）問及其對程、朱、陸、王學問的看法時，舜水答曰：

宋儒之學可為也，宋儒之息氣不可師也。至若陽明之事，偶舉其說「良知是赤的」，以為笑談耳。故曰「良知豈是赤來的」，非僕宗陽明也，信勿深疑。¹²

8 同前揭黑住真論文，頁20。

9 詳請參照渡邊浩，《近世日本社会と宋学》（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黑住真，〈儒教の日本化をめぐる〉，《日本学》第12號，1988。

10 田村圓澄等編，《日本思想史の基礎知識》（東京：有斐閣，1974），頁280。

11 朱舜水，〈答某書〉，《朱舜水集》，頁110-112。

12 朱舜水，〈答加藤明友問〉，《朱舜水集》，頁382。

於〈答奧村庸禮書〉中針對朱熹力詆陳亮（1143-1194）一事，則表示「議論未必盡然」。¹³答覆古市務本之間的「自知王者聖賢之道之為美，自知老佛之徒之邪之偽，不待辨而自明矣」，¹⁴則呈現迴避空論、強烈闢佛的立場。¹⁵因此，朱謙之評舜水「可以算是宋明理學的一個反對派，卻不能與宋明理學從根本上劃清界線，他介紹中國文化到日本時，有時不免精粗混雜，泥沙俱下」。¹⁶舜水傳播儒教思想非以著述為主，而是透過筆談（對答）或信函的方式與人交流，除了針對諸多經典史籍批駁、闡述自己的觀點外，有非學術性的社會經驗談，也有強調親民的「人倫日用」實務論，如此的獨特風格在德川前期「雜學性」濃厚的日本社會傳播儒教，自也得到其寬廣的揮灑空間。本文是釐清朱舜水整體思想脈絡的一環，主要解析他對水戶藩傳播學問的內涵，進而探討其「禮」的思想主張與德川儒教發展的關係。

三、朱舜水與水戶藩的儒教發展

德川光圀就任水戶藩主後，立志修史，並計畫開設「彰考館」以延攬天下才俊。¹⁷認為「學道者皆謂之儒，吾亦儒也」。¹⁸因感於興學普及教育的重要性，力主在水戶藩發展儒教，這也是他排除萬難禮聘朱舜水的主要原因。舜水主張為學「當有實功，有實用……有關於國家政治」、¹⁹取其應用於社會的實務面；強調自古名將尚武之餘多能兼修德術，為將者不讀書是「恃勇力而干禮義」，能讀書則「廣才智而善功名」。²⁰對於武士，朱舜水傳達了朱子學王道思想正統論的理念，強調知書達禮將可遏止武力之行使，建議主政者積極培育人才，知人善任，以建立尊禮重道的祥和社會。²¹這些主張、建言與當時光圀發展教

13 朱舜水，〈答奧村庸禮書〉，《朱舜水集》，頁 274。

14 朱舜水，〈答古市務本問〉，《朱舜水集》，頁 379。

15 有關朱舜水的闢佛主張，請參照拙稿〈朱舜水的闢佛思想：論其與德川社會思想界的相互影響〉，《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 3 號（大阪：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センター，2008），頁 355-374。

16 朱謙之，〈前言〉，《朱舜水集》，頁 5。

17 德川光圀於彰考館之修史事業相關研究，請參閱拙書《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頁 97-114。

18 朱謙之，〈德川光圀〉，《朱舜水集》，「附錄五 友人弟子傳記資料」，頁 802。

19 朱舜水，〈答小宅生順問〉，《朱舜水集》，頁 406。

20 朱舜水，〈答小宅生順書〉，《朱舜水集》，頁 312。

21 詳請參閱拙書《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頁 97-114。

育的目標是契合的。而實質上朱舜水在江戶、水戶講學期間，培育了安積覺（澹泊，1648-1722）、今井弘濟（1651-1689）²²、栗山潛鋒（1670-1706）等年輕學者投入《大日本史》的編纂與普及儒教的行列。²³光圀因而給予莫大的肯定，曰：「十數百年未有之禮，先生以教日本之人，莫大之恩」，²⁴這印證了舜水在彼地傳播禮教之貢獻。

相關先行研究方面，吾妻重二於其〈水戶德川家と儒教儀礼：祭礼を中心に〉、〈水戶德川家と儒教儀礼：葬礼をめぐる〉²⁵等文中，透過水戶藩之家廟營造、廟祭、祖先祭祀、墓祭、祝文等的內涵考察，論述舜水所給予的影響。此外，田世民的〈水戶藩の儒礼受容：『喪祭儀略』を中心に〉²⁶一文，則鎖定光圀依據《文公家禮》而制訂頒行的《喪祭儀略》一書，探討水戶藩之儒禮受容問題；並剖析舜水在水戶藩喪祭禮制實踐上所扮演的角色，釐清其人、

22 今井弘濟原為水戶藩醫，寬文七年（1667）至元祿二年（1689）入彰考館參與《大日本史》之編修。期間亦奉命對《保元物語》、《平治物語》、《源平盛衰記》、《太平記》等作考訂及修史工作。延寶四年（1676）二十四歲時，奉德川光圀之命，學於朱舜水，至1682年舜水終老為止。

23 《大日本史》由水戶藩主德川光圀設立彰考館後，於明曆三年（1657）起編，完成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歷時二百五十年。內容為「本紀」、「列傳」、「志」、「表」等四部分所構成的編年史書，計三百九十卷、目錄五卷。「本紀」依年代記載歷代天皇的事蹟，「列傳」則羅列約二千五百人的傳記，如后妃傳、皇子傳、皇女傳及臣下的傳記。王臣傳之外，又從將軍傳、將軍家族傳分類為學者、文人傳，或叛臣傳、逆臣傳，甚至於記載外國歷史的諸蕃傳。這些分類的工作主要由朱舜水的弟子安積澹泊負責籌劃進行。《大日本史》另一個精神主軸是闡述尊皇的忠義思想，由德川光圀、安積澹泊、栗山潛鋒等水戶學派一脈相承，安積澹泊、栗山潛鋒為朱舜水的近身弟子，栗山潛鋒曾就學於崎門學派的山崎闇齋，同時接受朱舜水的建議，每月讀《新五代史》及宋朝范祖禹的《唐鑑》，他接受德川光圀徵聘為彰考館國史編輯之後，召集水戶藩的文學之士，蒐集日本中世以還的諸家傳記，整理、撰寫了六十餘種文獻。有關朱舜水與崎門學派的關係，請參閱拙書〈朱舜水の実学思想と日本の受容〉，《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04），頁63-68。

24 朱舜水，〈服部其哀寄朱舜水書〉，拙編，《新訂朱舜水集補遺》（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125。

25 詳請參考吾妻重二，〈水戶德川家と儒教儀礼：祭礼を中心に〉，《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3號（大阪：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センター，2008），頁210-245；同〈水戶德川家と儒教儀礼：葬礼をめぐる〉，《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25號（東京：早稻田大學東洋哲學會，2008），頁1-25。

26 田世民，〈水戶藩の儒礼受容：『喪祭儀略』を中心に〉，《京都大学教育学部紀要》第53號（京都：京都大學大学院教育學研究科，2007），頁137-149。

其著作對相關層面的牽動。

以下將從「興教育、行禮制」、「養君德、親賢士」等儒家基本德目，進一步檢視舜水、光圀的禮教主張與實踐情形。

（一）興教育、行禮制

朱舜水認為興國首重教育，而教育之普及端賴廣設學校，因此撰寫「議」文闡述其意見，曰：

庠序學校誠為天下國家之命脈，不可一日廢也。非庠序之足重，庠序立而庠序之教興焉，斯足重爾。虞、夏、商、周以至於今，未之有改也。是故興道致治之世，君相賢明，其學校之制，必釐然具舉，煥乎可觀。於是人才輩出，民風淳茂，而運祚亦以靈長。²⁷

以「國家命脈」凸顯教育的重要性，強調明朝雖不及三代、兩漢時的隆盛，仍持續修禮制、興學校。文中並詳細介紹中國的學校體制等級，以資參考。又於〈元旦賀源光圀書〉中，以「伏以治道有二，教與養而已。養處於先，而教居其大。蓋非養則教無所施，此奚暇治禮義之說也；非教則養無所終，此飽食暖衣、逸居無教之說也。故教者，所以親父子，正君臣，定名分，和上下，安富尊榮，定傾除亂，其效未可一言而喻也」，²⁸說明主政者對於「教」與「養」應有的責任、態度，以及普及教化後得以建構的政教藍圖。

光圀明瞭興學普及教化的重要性，無奈彰考館的《大日本史》修史事業已佔去水戶藩財政的三分之一，現實情勢並不容許廣設學校。對此，光圀採行權宜之策，於彰考館內開設「史館講釋」，舉辦「史館月次」、「御前月次」、「御次月次」以及「御次讀書指南」四種講座，由彰考館學者輪流主講，開放給群臣不分貴賤前來聽講。至於水戶之講座教室，則設於森尚謙、宮井道仙的自宅。舜水逝世後，舜水祠堂（駒籠別莊）也成為講座教室之一。²⁹這是光圀在興學教化上的實踐成果。

1669（寬文9）年，朱舜水七十歲，經常臥病在床而萌生告老之念，於是上呈〈與源光圀告老啟〉，文曰：

伏以〈內則〉著引年之禮，《春秋》垂請老之文，蓋使有志者委使命以安時，薄植者循典例而恬退。……禮義之關，無容踰越；廉恥

27 朱舜水，〈學校議〉，《朱舜水集》，頁461-462。

28 朱舜水，〈元旦賀源光圀書〉，《朱舜水集》，頁115-116。

29 梶山孝夫，〈義烈兩公と教育〉，「水戸学講座」第二回，2000年9月3日，頁2-3。

攸係，不敢因循。³⁰

舜水舉《禮記·內則》：「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春秋左傳》卷二十九魯襄公三年：「祁奚請老」為例，強調自己告老身退將有助於賢能者受進用，是合乎禮義廉恥的作為。

不過，德川光圀予以強力慰留，並於同年11月12日設養老之禮，饗舜水於後樂園，³¹「授几杖而禮養焉」。³²翌年，舜水以檜木作棺，漆而藏之，為自己身後預作準備，並向門生說明這項舉措的緣由，曰：

我既老在異邦，自誓非中國恢復，不歸也。而或一旦老疾不起，則骸骨無所歸，必當葬於茲土。然汝曹素不知制棺之法，臨期苟作，則工手不精，制度不密。數年之後，必致朽敗。後來儻有逆虜敗亡之日，我子若孫有志氣者，或欲請之歸葬，而墓木未拱，棺槨朽弊，則非徒二三子之羞，亦日域之玷也。吾之所以作此者，非為手足也，為後日慮耳，況《禮》有「七十月制」之文乎。³³

誠如舜水所述，《禮記》〈王制〉篇及〈內則〉篇中關於養老之禮，亦即尊耆養老制度，有詳細的記述，包括食、衣、住、行、朝見乃至棺木的準備等，以「十歲」作為依據，鉅細靡遺地為耆老作出分齡照護的奉養規劃。首先「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舜水於後樂園所受的饗禮，在飲食之禮中是相當隆重盛大的；其次，是君王對年高德劭者賜鳩杖助行的授杖之禮，所謂「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至於舜水未雨綢繆為自己準備壽棺，其實也是根據「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

30 朱舜水，〈與源光圀告老啟〉，《朱舜水集》，頁144。

31 後樂園，又稱「小石川後樂園」，名稱取自范仲淹〈岳陽樓記〉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水戶初代藩主德川賴房建於寬永六年（1629），後由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完成。園內之「圓月橋」、「西湖」依朱舜水意見建造，園名亦是朱舜水選定的。

32 據朱舜水門生今井弘濟、安積覺之〈舜水先生行實〉記載，11月16日德川光圀復親臨朱舜水宅邸，「酒穀幣帛，禮接稠疊，新製屏風，畫以倭、漢年邵德高者六人（按：武內宿禰、藤原在衡、藤原俊成、太公望、桓榮、文彥博），祝其遐壽，盡歡而歸。是歲，先生作〈諸侯五廟圖說〉，博採眾說，通會經史，旁考古今，以理折衷，識者皆謂不朽之盛典。」《朱舜水集》，頁619。

33 今井弘濟、安積覺，〈舜水先生行實〉，《朱舜水集》，頁619。

唯絞、紵、衾、冒，死而后制」之禮，³⁴換句話說，六十歲以上就應置棺備用，並且隨年歲老邁於每年、每季、每月、每日省視保養棺木。前揭舜水說明備棺緣由所言及的「七十月制」應是「七十時制」之誤。從舜水這些切身事蹟，亦可觀察到光圀與舜水對相關禮制的實踐。

就在舜水備棺的同一年（1670），光圀請舜水撰寫《學宮圖說》，命工匠以木模完成縮小至三十分之一比例的文廟、啟聖宮、明倫堂、尊經閣、學舍、進賢樓、廊廡、射圃、門樓、牆垣等殿堂結構。今井弘濟、安積覺對於建造過程描述如下：

而殿堂結構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曉者，先生親指授之；及度量分寸，湊離機巧，教喻縝密，經歲而畢。³⁵

大至廟堂、小至簠簋等祭器，舜水都能依圖考古、研究製作方法，並且精確地指導匠師做出成品。由於經常接受廟典墓祭等相關禮教問題之詢問，為免誤答而欺人耳目、貽笑百世，不得不「歷考經傳所載及前賢議辯」、「酌古準今」後，³⁶才審慎答覆。誠如安積覺形容的「大而禮樂刑政之詳，小而制度文物之備，靡不講究淹貫」。³⁷而舜水努力付出所獲得的肯定與迴響，則可從以下這件事深刻感受到。

1672（寬文12）年冬天，彰考館落成，光圀請舜水改定儀注，並率儒生詳明儀節、習釋奠禮，讓習禮者得以通曉梗概。翌年再度於別莊（水府侯駒籠別莊）演練後，習者均能精究其禮。當時人在柳川的門生安東省菴（1622-1701）聞訊，曾經發函表達欽羨、讚嘆之意，曰：

敬聞上公（按：德川光圀）大使諸士習釋奠禮，伏讀圖及儀注，擊節歎曰：「千百年來未曾聞之事，尊聖好道之厚，天下之善孰大焉，真不世出之明君也！」先生參考諸書，斟酌裁定，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其功豈鄙人所得而稱歎！加賀公（按：前田綱紀）亦歎稱。大國之君好德如此。道之興隆在此時，感歎之餘，不覺流涕，所謂「維嶽降神」，興周道於東方者也。³⁸

34 《禮記》卷第四，〈王制〉第五，頁21b。收入《中國古代儀禮文獻彙編15》《禮記》二十卷，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10，頁236。

35 今井弘濟、安積覺，〈朱舜水先生行實〉，《朱舜水集》，頁619。

36 朱舜水，〈五廟圖序〉，《朱舜水集》，頁482。

37 安積覺，〈朱舜水先生文集後序〉，《朱舜水集》，頁786。本序撰於日本正德二年（1712）。

38 安東省菴，〈上朱先生書〉，《朱舜水集》，頁756。

即使日後舜水離開人世，安東省菴對於十年前的盛事仍銘感其影響深遠，於〈悼朱先生文〉中記曰：

（按：上公）嘗命先生斟酌古今，選釋奠之書，教諸士，習其禮，三代禮儀，悉備於斯時。見者聞者，無不稱賞歎服。曰：「不圖禮儀之美至於此矣。」或曰：「一至此地，不嚴而肅，驕慢之氣，不覺銷鎔頓盡。」其間老成人至有泣下者。明德之馨，使人薰陶興起者如此，誰不尊崇焉。³⁹

而躬逢其盛的安積覺，在事隔三十五年後形容當年舜水率府下士子講肄禮典的情景，說道：「周旋規矩，蔚有洙、泗之風，距今三十餘年，猶聞其馨歎也」。⁴⁰

（二）養君德、親賢士

「興邦之大道非一，而其要止在於尊賢。」⁴¹如何選賢善任？自古即是為政者難解的課題，所謂「選者賢，與者能，則萬事皆理；選者不賢，與者不能，則萬事皆亂」。⁴²至於如何選立世子、慎選教育輔翼世子成長的太傅？則更是茲事體大。德川光圀為水戶初代藩主德川賴房（1603-1661）之三子，卻於六歲時取代長兄賴重（1622-1695）被立為世子。越序襲位之事令光圀耿耿於懷，直到十八歲閱讀《史記·伯夷列傳》，對其中叔齊與自己處境類似而感觸深刻，經過深思熟慮，決定於繼任藩主之位後，選立長兄賴重之嫡子為世子，以回歸禮制、還位於嫡系子嗣。1661年光圀於正式繼承藩位的同時，果然宣布收姪子綱方（1648-1670）為養子並立為世子。不料，1670年春天，德川綱方年僅二十三歲即因感染天花病逝（諡靖伯），光圀頓而面臨痛失繼承人的局面。針對此事，基於「世子必非久虛之位」，儘管光圀尚處於悲痛時期，舜水仍上呈「啟事」（陳述事情的奏章或函件）催促早立儲君，並且「願上公博選賢者以為之傅，其次為之少傅。必誠實端正，寡言曉事，有學有識之人，方能成就儲德，若徒好好先生而已，無益也」，⁴³期許光圀能選賢、用賢，為世子慎選良師。翌年，1671年夏天，光圀收長兄賴重之次子、也就是綱方的弟弟綱條（1656-1718）為養子，並立為繼任之世子。而綱方逝世後，其舊宅邸被改建為彰考館，成為

39 安東省菴，〈悼朱先生文〉，《朱舜水集》，頁 737。

40 安積覺，〈舜水朱氏談綺序〉，《朱舜水集》，頁 794-795。本序撰於日本寶永四年（1707）。

41 朱舜水，〈謝源光圀賀七十算啟〉，《朱舜水集》，頁 144。

42 朱舜水，〈勉水戶世子書〉，《朱舜水集》，頁 150。

43 朱舜水，〈與源光圀啟事〉，《朱舜水集》，頁 134。

《大日本史》編史事業之重鎮。

朱謙之編《朱舜水集》中收有內容以舜水感謝綱條餽贈山珍海味為主的〈與源綱條書〉八首；勉勵水戶世子「預養君德」、「親賢與能」、「好善惡惡」的〈勉水戶世子書〉三首；⁴⁴以及說明為綱條取字號為「九成」之典故、意涵的〈源綱條字九成說〉一文。

從〈源綱條字九成說〉⁴⁵文章冒頭之「世子閣下，會當冠阼之吉」，可以得知本文寫於綱條十六歲行「冠禮」、「世子嗣位禮」亦即1671年時。「大名綱條，謹字之曰九成，順成德也。親賢樂善，保大定功；好問好察，繼志述事，以祈黃耇無疆，受之天慶」。「九成」語出《尚書·益稷》之「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意指樂音悠揚動人，臻至盡善盡美，致能吸引靈鳥來儀。所謂「始條理為知，終條理為聖，合九成而為一大成」。然而，端賴樂技出眾如后夔（舜臣，掌樂之官），即可達到極致嗎？非也，「是皆其條目也，必有為之綱者焉」。舜水巧妙地

44 朱舜水，〈勉水戶世子書〉三首，《朱舜水集》，頁149-151。茲將其內容載錄如下，以利參考：

一、康侯之子，為行有五。何謂五行？以君人之行合之為子、為臣、為弟、為少之行而五也。康侯之嫡，是為世子。儲副之重，其任固已不輕矣。他日邦家之奉，盡集於躬，臣民之責，咸萃於己。不能豫養君德，而一旦出身加民，鮮有能勝其任而愉快者。哀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憂，未嘗知懼。」程子曰：「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合二說而觀之，可以知君德之養矣。親賢士大夫則莊敬而日強，不則安肆而日偷，蓋常人之情，稍不自檢束，斯已入於安肆矣。然古來嫌疑不一，或知而不敢為。今世子以至公無私者為之文，青出於藍，冰寒於水，斯為善矣。豈以收拾人心為患哉？

二、選者賢，與者能，則萬事皆理；選者不賢，與者不能，則萬事皆亂。昔者武王問於太公曰：「舉賢而或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能，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何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好用小善而已不能得真賢也，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以譽為功，以毀為罪。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故羣臣比周而蔽賢，羣黨而行私。」夫武王賢王也，猶且以此為懼，況其下焉者乎？然而知人其難矣，非有學以廣其誠，非由誠而至於明，固未易言也。

三、哀公問於孔子曰：「君子何為其惡惡道如是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必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民之親之也必不能甚。」哀公曰：「善哉！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非孔子吾安得聞斯言也哉？」甚矣人君之好惡宜慎也！又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大學曰：「此謂惟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可見愛惡之道，非仁者不能得其當，善其用也。其可忽諸？

45 朱舜水，〈源剛條字九成說〉，《朱舜水集》，頁445。

將名「綱條」、字「九成」之底蘊奧義推行出來。

詮釋「九成」之典故、意涵之後，文章後半是舜水對綱條的期許與勉勵。舜水認為奉行「大孝之德」得以「維德動天，無遠弗屆」；克盡「君臣修敘」、得以「好生從欲，洽於民心」；秉持「至誠」則「能使天下後世，觀者聽者，莫不欣欣而興起焉。」然而，積德累仁絕非一蹴可至，「專其心，致其志；非類之徒，無稽之言，勿使得撓其慮；逸欲之端，不急之務，勿使得紛其心。業積而不渝，功高而愈奮。」這些規範若能遵行不悖，則「迥出雲表，俯瞰萬物」之日自然可待。

審視至此，由於前後出現兩位世子，筆者希望進一步探究朱舜水與綱方之間的互動。可是，《朱舜水集》中卻遍尋不著二人直接往來的書信或對談記錄，僅可在舜水上呈光圀的若干書函，窺見關於綱方的事蹟或描述。既然如此，另闢途徑，或可從較易取得參閱的《朱舜水全集》作更深入的考察。

稻葉君山編纂之《朱舜水全集》，⁴⁶又稱「稻葉本」，是「加賀本」五十川剛伯編《明朱徵君集》⁴⁷與「水戶本」德川光圀輯、德川綱條校《朱舜水先生文集》⁴⁸的合刊本。除了總目次之外，「稻葉本」仍保留「加賀本」、「水戶本」各自的目錄，透過對照及確認程序，以「水戶本」為底本、增刪「加賀本」之文章後，編輯刊出。當筆者取《朱舜水集》與這三種版本，針對〈與源綱條書〉八首、〈勉水戶世子書〉三首、〈源綱條字九成說〉等上述「世子」相關書函進行對照比較，結果發現各版本收錄情形不一。「稻葉本」和朱謙之《朱舜水集》屬於彙整型版本，基本上已全數收錄；差異性是出現在「加賀本」與「水戶本」

46 稻葉君山編纂，《朱舜水全集》二十八卷（東京：文會堂，1912年鉛印本）。本書是五十川（源）剛伯（?-1699）編的加賀本《明朱徵君集》與德川光圀輯、德川綱條校的水戶本《朱舜水先生文集》之合刊本，通稱「稻葉本」。全書包括：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857-1929）的序文、朱舜水肖像、朱舜水墓圖、楠公訣兒圖讚、朱舜水墨蹟、《朱舜水先生文集》、《明朱徵君集》、〈泊舟稿〉、〈朱舜水全集附錄〉。

47 《明朱徵君集》十卷，是日本人最早整理的朱舜水文集，於朱舜水逝世翌年之1684年由加賀藩主前田綱紀命其儒臣五十川剛伯編輯。本文集因為整理倉促，有不少缺漏，無法呈現朱舜水在日本活動之全貌。後經前田綱紀加以修改增補，可惜通稱為「加賀本」的文集未及刊行，前田綱紀即已離開人世。《明朱徵君集》現存於東京「尊經閣文庫」。

48 《朱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由德川綱條於1715年校刻完成。安積覺的手校本，現藏於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通稱「水戶本」。本書收錄朱舜水之遺文墨寶計六百七十四項，其題書曰：「門人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輯，男權中納言從三位源綱條校」，前有安東省菴之序，後有安積覺之跋。

之間。首先是文章題名之差異，儒臣五十川剛伯編的「加賀本」稱〈上水戶世子書〉（僅有一首）、〈水戶世子源綱條字九成說〉，當事者源綱條校勘的「水戶本」則稱〈與源綱條書〉（共八首）、〈源綱條字九成說〉，明顯隨編纂者之身分地位與立場不同而呈現異趣。不過最值得吟味的差異在於「加賀本」收有〈勉水戶世子書〉三首，⁴⁹「水戶本」卻未見收錄。這讓筆者思及，「水戶本」似乎刻意不著錄源綱方相關書函。同時，也正因為「水戶本」未錄〈勉水戶世子書〉三首，意味著舜水勉勵的對象是綱方而非綱條。

誠如前述，綱方早於 1665 年 7 月朱舜水移住江戶前的 1661 年十四歲時，即已成為世子。在催促早立儲君的〈與源光圀啟事〉一文中，舜水提及：

丙午年，伊藤玄蕃謂瑜曰：「世子^{靖伯}_{世子}，好奕棋，恐非美事。」瑜曰：

「不妨，奕棋雖非美事，然富貴人必有所好，猶愈於聲色狗馬也。」⁵⁰

首先可以看到，「水戶本」特別註記世子指的是諡號「靖伯」的綱方。其次，丙午年經查為 1666 年，換言之，在舜水初抵江戶的翌年，即曾與水戶家臣伊藤玄蕃論及世子綱方的德性問題。除此之外，「水戶本」卷四〈與源光圀書〉十九首中，排次居首的書函，文中亦出現與世子相關的內容。曰：

世子聞篤志好學，倦則習書。誠能循循若此，不獨他日弓冶箕裘；友邦家君，皆可越而軼之。前者面啟云：「邦君凡百好尚皆有害，惟好讀書進德，則日益而無損。」但在加意懋勉之耳。⁵¹

由於此函排在第二封文曰：「十五日入朝，承諭日本風俗，丈夫以四十二歲為厄，因及婦女以三十三歲為厄」，⁵²以及第四封文曰：「今年厄歲之說……」⁵³等勸阻光圀切勿迷信的書函之前。故推測前函可能撰於 1669 年光圀四十二歲稍前。文中的「世子」可能是指時年二十二歲的綱方。

又，同一系列書函中，排次十二的文章，撰曰：

49 朱舜水，〈勉水戶世子書〉三首，《明朱徵君集》，見稻葉君山編纂《朱舜水全集》，頁 625-626。

50 朱舜水〈與源光圀啟事〉，《朱舜水集》，頁 134。

51 朱舜水，〈與源光圀書〉，稻葉君山編纂，《朱舜水全集》，頁 63-64。朱謙之編《朱舜水集》作〈與源光圀書〉，文中「友邦家君」作「友邦冢君」，頁 117-118。

52 朱舜水，〈與源光圀書〉，稻葉君山編纂，《朱舜水全集》，頁 64。朱謙之編《朱舜水集》作〈與源光圀書〉，頁 118。

53 朱舜水，〈與源光圀書〉，稻葉君山編纂，《朱舜水全集》，頁 66。朱謙之編《朱舜水集》作〈與源光圀書〉，頁 119-120。

初四日伏承瑤札，捧讀甚為惶媿！禮當即日裁復，緣是日遂聞有世子惠臨之命。……二十一日幸辱世子枉顧。……下問三事，志大而見卓，非尋文書生循行數墨拘守章句之所及。若能專篤弗懈，克廣德心，自高曾以下，咸嘉賴之，豈惟萬人以貞而已哉？可為預賀已！⁵⁴

本書函缺乏推測撰文時間的線索，但是從文意上來看，與排次居首的書函所描述之人物圖像，似乎相去不遠。

無獨有偶，除了〈勉水戶世子書〉三首，另有一篇〈與源光圀啟〉⁵⁵也是「加賀本」以〈上水戶侯宰相源公啟〉⁵⁶為題予以收錄，而「水戶本」卻不得見。原因應該是在於，其內容明顯言及世子綱方的病情，曰：

初六日，聞世子發疹，昨日入朝奉候，但見大小臣工，莫不歡欣悅豫，已知疹候必佳。及聞飲食起居，事事輕快，誠為深喜，或不分于田之思也。

檢視至此，可以歸結出「水戶本」在處理內容觸及已故世子綱方（靖伯）的文章時，除去〈太廟典禮議 靖伯世子祔廟〉以及內容未明確顯示與綱方相關者，原則上不予著錄。因此，看不到任何舜水與綱方交流之往來文書，惟有在舜水上呈光圀的信函中，並且指涉對象模稜兩可（似綱方、若綱條）的情況下，才會加以收錄。以下再從另一觀察角度切入。

誠如所見，「水戶本」清楚地收錄了〈與源綱條書〉八首，綜觀其內容，除了其一言及：「某惟世子之所以為世子者，易而難，難而易。願世子深思其所以易，敦勉其所以難，則一邦以貞，而兆民永賴矣」，文辭淺顯但略有傳經弘道的意涵。其餘七篇，則大抵感嘆自己年邁體衰、力有未逮，以及表達感謝餽贈之意。這與引經據典而意切理深之〈勉水戶世子書〉三首，說理深度不同，用情程度似乎也不同。為何同樣是寫給「世子」的書函，竟然存在如此大的落差？關鍵可能在於，〈勉水戶世子書〉勉勵的對象既然是綱方，其撰文時間應是介於朱舜水抵達江戶的1665年7月至綱方病逝的1670年3月，亦即舜水66~71歲、綱方18~23歲時。這段期間是舜水初來乍到、正想為興學宣揚儒家思想而有所作為之際；也是綱方學識涵養達到一定程度、正欲深入探究學術殿堂的時

54 朱舜水，〈與源光圀書〉，稻葉君山編纂，《朱舜水全集》，頁69。朱謙之編《朱舜水集》作〈與源光圀書〉，頁123。

55 朱舜水，〈與源光圀啟〉，《朱舜水集》，頁142-143。

56 朱舜水，〈上水戶侯宰相源公啟〉，《明朱徵君集》，見稻葉君山編纂《朱舜水全集》，頁688。

候。指導者與學習者堪稱立足於對等的平台上，學問的授受關係得以成立。而這與前述兩首〈與源光圀書〉中，舜水所描述的世子的人物圖像，亦相對吻合。相較於此，舜水與綱條接觸應是始於綱條嗣位的1671年6月至舜水逝世的1682年5月，亦即舜水72~83歲、綱條16~27歲時，萌生退意後的舜水日益年老體衰，而年輕世子綱條卻剛站上起跑點，因此二人難有深入交流，僅能止於噓寒問暖的酬酢關係。雖然如此，舜水逝世後，光圀著手編輯的「水戶本」《朱舜水先生文集》，卻正是由綱條於1715年（正德五年）校刻完成，成為舜水的著作與思想主張得以流傳後世的重要推手。

四、結論

在符合德川前期政經穩定、文治文化萌芽，學術宗教各有選擇、各有趨歸的「雜學性」，以及獲得德川光圀行政力、財力、人力的支持下，朱舜水的思想主張得以在日本開疆闢土、發展出一片天地。尤其透過興學普及教化，以及禮制的實踐與推展，明確地看到由己推人、由近及遠的影響力與成效。舜水認為：

禮為仁義之節文，天倫秩序，故曰：「天秩有禮。」又曰：「禮，經國家，定社稷，衛民人，利後嗣者也」。⁵⁷

在答久留米藩（今福岡縣）藩儒明石源助的書簡中，也針對「禮」作了如下的詮釋，曰：

知禮之國，當藉君、卿、大夫，愛惜存全之；未知禮之國，當賴明哲賢豪，講求而作興之，以登進於有禮。不然，其何以自異於椎結、箕踞、雕題、鑿齒之屬哉？禮者，乃天理自然之節文，初非苛禮多儀之謂也。然講求而作興，非博覽旁搜，寤寐孜孜焉不可得已，故學問之道為貴也。⁵⁸

所謂「禮者，乃天理自然之節文」，這顯然是源自程朱「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的思惟。

舜水曾於〈元旦賀源光圀書〉中強調：「聖人之大德，莫重於施仁，仁政之大端，莫先於養老」，⁵⁹而實際上源光圀在敬老養老之禮制上，都能發自內

57 朱舜水，〈禮〉，《朱舜水集》，頁492。

58 朱舜水，〈答明石源助書〉，《朱舜水集》，頁83。

59 朱舜水，〈元旦賀源光圀書〉，《朱舜水集》，頁114。

心地遵行不悖。甚且為求禮備，要求舜水撰寫《學宮圖說》，改定儀注，並率儒生習釋奠禮、詳明儀節等，種種舉措都是光圀針對禮制的學習與實踐。乃至光圀編輯、綱條校刻的《朱舜水先生文集》中，刻意不著錄已故世子綱方相關書函的這件事，應該也是基於禮制的考量。為的是端視聽、正名分。當然，可能也蘊含避免觸文生情的情感考量。足見光圀二度立長兄嫡子為繼承人，其欲還位於正統禮制的堅持與決心，更是無庸置疑；至於舜水個人對於禮制的實踐，則透過告老，備棺，乃至「歷考經傳所載及前賢議辯」、「酌古準今」以求正確答覆來自各方針對禮樂刑政、文物制度疑問的此番努力，都是合乎禮制的作為。

「禮也者，不特為國家之精神榮衛，直乃為國家之楨幹。在國家為國家之幹，在一身為一身之幹，未可蔑也。」⁶⁰大道之行，「近世中國不能行之，而日本為易。在日本他人或不能行之，而上公為易」。⁶¹又誠如朱舜水在答木下順庵書簡時所述：

《禮》曰：「學則善人多，而不善人少。」夫善人多所以興道，不善人少所以致治。今貴國君英年駿發，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斯貴國之福也。⁶²

透過朱舜水的傳播與體現，教化禮制在德川光圀、在水戶藩、在日本都看到一些示導作用。

60 朱舜水，〈答明石源助書〉，《朱舜水集》，頁 83。

61 朱舜水，〈元旦賀源光圀書〉，《朱舜水集》，頁 113。

62 朱舜水，〈答木下貞幹書〉，《朱舜水集》，頁 202。

引用書目

一、史料

《禮記》卷第四，〈王制〉第五，頁21b。收入《中國古代儀禮文獻彙編15》（《禮記》二十卷），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10，頁236。

五十川剛伯編，《明朱徵君集》十卷，通稱加賀本，1684，東京「尊經閣文庫」所藏。

德川光圀輯、德川綱條校刻，《朱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通稱水戶本，1715，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安積覺手校本。

稻葉君山編纂，《朱舜水全集》二十八卷，東京：文會堂，1912年鉛印本，通稱稻葉本。

二、中文論著

朱謙之編，《朱舜水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徐興慶，《新訂朱舜水集補遺》，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徐興慶，《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

三、日文論著

1. 專書

井上哲次郎，《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東京：富山房，1945。

田村圓澄等編，《日本思想史の基礎知識》，東京：有斐閣，1974。

西晉一郎講述、野口恒樹・野木村規矩雄筆記、木南卓一校補，《日本儒教の精神：朱子学・仁斎学・徂徠学》，大阪：溪水社，1999。

徐興慶，《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04。

黑住真，《近世日本社会と儒教》，東京：ペリカン社，2003。

渡邊浩，《近世日本社会と宋学》，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

2. 期刊論文

田世民，〈水戶藩の儒礼受容：『喪祭儀略』を中心に〉，《京都大学教育学部紀要》第53號（京都：京都大學大學院教育學研究科，2007），頁

137-149。

吾妻重二，〈水戸徳川家と儒教儀礼：葬礼をめぐる〉，《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25號（東京：早稲田大學東洋哲學會，2008），頁1-25。

吾妻重二，〈水戸徳川家と儒教儀礼：祭礼を中心に〉，《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3號（大阪：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センター，2008），頁219-245。

徐興慶，〈朱舜水の關佛思想：論其與徳川社會思想界的相互影響〉，《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3號（大阪：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センター，2008），頁355-374。

徐興慶，〈異城知識人の出会い：朱舜水と安東省菴の思想異同試論〉，《日本漢文学研究》第4號（東京：二松學舎大學COE卓越研究計畫，2009），頁218-256。

徐興慶，〈日本の朱舜水研究史〉，《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第31卷第4期，2009，頁1-7、29。

徐興慶，〈加賀藩における朱舜水の思想の普及〉，《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文化情報の発信と受容》（東京：雄松堂，2010），頁439-457。

徐興慶，〈近世における日中の経世致用觀：朱舜水と貝原益軒を比較して〉，《経書解釈の思想史：共有と多様の東アジア》（東京：ペリカン社，2010），頁59-96。

徐興慶，〈東アジアの視野から朱舜水の思想と宗教觀を考える〉，《東アジアの宗教と思想》（大阪：関西大學文學部，2010），頁141-161。

高島元祥，〈日本儒教の多様性〉，《比較日本学教育研究センター研究年報》第7號（東京：お茶の水女子大学，2011），頁175-178。

梶山孝夫，〈義烈両公と教育〉，「水戸学講座」第二回，2000年9月3日，頁2-3。

黒住真，〈儒教の日本化をめぐる〉，《日本学》第12號，1988。

The Practices of Ritual of Zhu Shunshui and Mitohan in Edo Period

Shyu, Shing-ching*

Abstract

Zhu Shunshui's (1600-1682) direct or indirect contact with scholars of the Zhu Xi school, the Yangming school or even the Old Text school in the early Tokugawa period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n Japan.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Zhu Shunshui's essays, correspondences and many writings from his disciples, it was found that he often expressed his viewpoints to Japa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scholars. Zhu Shunshui stayed in Nagasaki, Edo, and Mito. Nevertheless, his promotion of Confucianism can be traced from Kashima (modern Saga), to Yanagawa (modern Fukuoka) to Kaga (modern Ishikawa) around the Sea of Japan—all places he had never been.

This paper is focused on the study of (1) the development of a broad-ranging Confucianism in the early Tokugawa period and (2) the perspective of Zhu Shunshui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ito Confucianism, an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onfucianism—the concepts of ceremonial rites, *xing jiaoyu xing lizhi* (promote education, perform rituals), and *yang junde qin xianshi* (develop a sovereign virtue, get close to virtuous gentlemen) between Zhu Shunshui and Tokugawa Mitukuni (1628-1700) and its impact on the practices of rites advocated by Seignior Mito.

Keywords: Zhu Shunshui, practice of ritual, Tokugawa Mitukuni,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xing jiaoyu xing lizhi*, *yang junde qin xianshi*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